



蒋雯丽的体操生涯

我自己现在也有了孩子,有时看着他在我的身边睡着了,那天使一般的表情,心里对他涌起无限的爱。我就会想,姥爷那时看我,也是这样的吧。那时,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是静止的。现在,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梭的。



姥爷把我送到体操房那天,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。我记得体育场空旷无比,长了很多半人高的野草。

主席台上空落落的。跑道边有人在踢球,有人在跑步,还有人练习跳高、跳远的。有裁判的哨声,还有文工团的歌声,特别响的是蝉鸣。我对体育场充满了恐惧,对“练体操”这件事也充满了恐惧。我迟疑地迈着步子,跟在姥爷身后,姥爷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,坚定地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我多么希望他能回头看我一眼,看我可怜巴巴的样子,心一软,就不去体操房了。可他就是不回头。他可能也知道,回了头就去不了了。

体操房是一座高大的红砖建筑,门框窗框都是绿色的,窗玻璃几乎全没了。在荒凉的体育场的一角,这座建筑像主席台一样的醒目。

体操房的隔壁,是文工团的宿舍。从那里传来了悠扬的歌声,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,紧张的心一下子松弛了下来,仿佛在天堂里漫步,仿佛片刻飞离了尘世,无比轻松自在。

体操房里的动静,比外面还要热闹响亮。

运动员们上下翻飞,各类器械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。教练一边指挥,一边大声吆喝,那情景很像现在的农场市场。

我和姥爷站在地毯边上,我俩都是第一次对体操有了活生生的印象。

那位史老师,笑嘻嘻地走到我们身边,虽然只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,却依然嗓音洪亮:

“唐大爷,这就是你的外孙女?”我吓得直往姥爷身后躲,姥爷却紧紧拉着我的手,满面笑容地把我推到史老师面前。

史老师捏捏我的肩膀,又把我的胳膊平举,上举了几下,边摆弄边问:

“小鬼,几岁了?想不想学体操?”

“刚刚八岁,当然想练体操了。”不待我回答,姥爷已经替我回答了。

那不是我的意思,姥爷,那是你的意思。现在已经做了母亲的我,才能体会姥爷的心,也真的同情那会儿的我。

我又何尝不是经常强加给孩子很多他不想做的事情?让他学习,让他练琴,让他……总之一切都是“为了他好”。

有一天,他突然含着泪问我:“你什么时候想过我的感受?”

我好久说不出话来。

是啊,孩子,我能说什么?三十多年前的姥爷又能说什么?我心疼你,可是社会的压力如何去抗衡?

就在我想要争辩的时候,史老师一把拉住我的胳膊,拖着我往地毯中间走。走了几步,把我往地上——把我的腿前后分开,尝试劈叉。

从没练过的我当然是劈不下去的,两条小腿只分开了一点点,屁股离地很高,像只被架起来的蛤蟆。突然,一阵撕心裂肺的巨痛从双腿传遍了全身——在我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,身强力壮的史老师已经整个人站在了我的身上,两只大脚牢牢地压在我那两条瘦弱的小细腿上了。我的屁股这下也牢牢地贴在地上了。

“啊!——”我歇斯底里地喊了出来,比

体操房里所有的声音都要响亮,响彻云空。

这位壮硕的史老师,抱着膀子,悠悠地站在只有八岁的撕心裂肺的我身上,说:

“想练体操就得能吃苦,我给你数十下,一、二……”

如果世间还有时间?我觉得那会儿没有了,每一个数字之间之漫长,如同宇宙间的光年。什么声音都没了,体操房的喧闹,知了的鸣叫,远处的歌声、哨声……只留下了空气的声音,还有那越等越久才发出的数字。史老师的那双大脚还不时地在我细嫩的小腿上颠两下,让我更像针刺一般。

什么叫心疼?我算领教了。什么叫昏天黑地?我算体会了。

被姥爷当花儿一样养到了八岁的我,在这个盛夏的下午,明媚的阳光中,知道了什么叫铭心刻骨。

终于,史老师从我的身上跳了下来,这双腿已经不属于我了。除了心在抖,泪在流,其他一切都不属于我了。

我不知道在地上趴了多久,让我的身体回到我的心里上来,让我的感知回到我的心里。

这时候,我想起了姥爷,对了,我亲爱的姥爷呢?

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怎么没有冲上来呢?他怎么没把史老师从我身上拉下去,狠狠地捶他一拳呢?我泪眼婆娑地四下里看,几个门口,几个犄角旮旯,都找不到姥爷的身影。难道他走了?难道他扔下我走了?姥爷确实走了。

当史老师跳到我身上的时候,他受不了了,看不下去了,走了。

八十八岁的姥爷那一路是怎么走回去的?走了多久?是像史老师喊的数字一样长久吗?他一定跟我一样颤抖着心,流着泪,在几乎空白的意识中往回走。

好不容易有了出路,看到了希望,没曾想,史老师意外受伤,伤势很重,不能再担任体操教练了。

刚来几天还没被正式接收到体操队伍里的我,面前那扇小小的后门被关上了。

市体校紧急从外地调来了一位新教练,新教练姓路,人长得很漂亮。

如果用现在奥运会体操比赛的运动员来做比喻,史老师应该是美国队的,而路老师更像是俄罗斯队或罗马尼亚队的。

路老师个子不高,体格也不粗壮,后背挺拔,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,声音响亮,穿透力极强,但不苟言笑,跟史老师的风格截然不同。

没有了史老师,又不认识路老师,我就被搁在那儿了,一搁就搁了三年。

什么叫“搁”呢?在这个业余体校的体操队里,我算是业余中的业余。

编制内的队员,穿着统一发放的体操服和体操鞋,我穿着自己的运动服和白球鞋;编制内的队员做动作时,有教练保护,我没有指导,也没有保护,自己在旁边模仿着教练的动作跟着练。

从我进了体操房,就一直是这么个状态,从来没改变过。我自己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,也从来没想到去问路教练,什么时候能把我转成正式队员?

姥爷一直鼓励我“好好练”,练好了,就可以转成正式队员了,就有体操服和体操鞋了,就可以去省体工队,不用上山下乡了。

别人练什么,我就在一边模仿着练。

摔了,爬起来,再练。我的模仿能力,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吧,居然还能得到教练的表扬:

“你们看看人家小鬼,没人教都能练成这样!”

小鬼,成了我在体操房的代名词。

当我正练着高低杠,别的队员也要练的时候,他们就会说:

“小鬼,一边儿练去!”

我赶紧下杠,站在一边看他们怎么做动作。

当我正模仿着教练,如醉如痴地练着自由体操的时候,突然听到教练大喊一声:

“小鬼,闪开!”

我立刻闪到一边,队员在教练的保护下,一阵风似的从我面前翻着小翻呼啸而过。

但是,教练表扬我了,虽然受到这些冷遇,都比不上教练的一句表扬。

突然间,我的信心大增,全国体操冠军蒋韶毅成了我的短期奋斗目标,世界体操冠军科马内奇成了我的偶像和长期奋斗目标。

那会儿,流行一本小说,叫《新来的小石柱》。小石柱是贫下中农的孩子,从农村来到省队,立志要练好体操,完成“空中转体 180 度”的高难度动作。他克服了重重困难(其中还包括“阶级敌人”的迫害),终于实现了梦想。

于是,小石柱,也成了我的偶像。

今天想来,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局面:一个八岁的孩子,被“上山下乡”的运动逼着,来到体操房,穿着洗旧的棉毛裤和发黄的白球鞋,每天在角落模仿别人的动作,自学自练。摔疼了,在地上趴一会儿,爬起来再练;胳膊扭着了,自己揉一揉,缓过劲儿再练;心里怀揣着“世界体操冠军”的梦想,却不知,那梦想比天上的星星还要遥远。

姥爷在满是花卉盆景的小院里,奇迹般地给我竖起了一个高高的单杠,所有来家里的人都要从单杠下走过,而姥爷也会美滋滋地坐在他的藤椅里,看着我在杠子上翻来翻去。

有时候,我还会跑到外面宽敞的巷子里去翻跟头,给邻居们表演,让他们知道我学了些什么。

邻居们纷纷前来围观,赞不绝口:

“小文丽,这个叫什么?”

“侧手翻。”

“这个呢?”

“拉拉提。”

“拉拉提是什么?”

“就是侧空翻。”

“小文丽不得了!”

“要当体操冠军喽!”

在一片赞誉声中,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越翻越来劲儿。晚上,当“斐多菲俱乐部”的叔叔大人们,聊时政聊累了,或者“隔墙有耳”需要调剂一下气氛的时候,就轮到我也上场了。两个个子大的叔叔,就把姥爷准备好的根又粗又长的竹竿子扛在肩膀上,嗓音洪亮的良师叔叔充当解说员,每日例行的“现场直播”开始。

“现在入场的是,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体操队员小文丽,她要给我们展示她最拿手的单杠项目,好,队员已经准备好了,比赛马上开始,看,她多么轻盈地翻身上杠啊,大家鼓掌!”

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。

姥爷靠在小床上,那是他的老位置,抽着烟袋,眯缝着眼睛,笑嘻嘻地看着我,满心欢喜,满眼得意。

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,我们是这样打发着我们的日子的。

后来,筹拍电影的时候,我又回到了体操房,问了当年那批“正式队员”中学得最好的,现任体操队教练的素华:“小时候你练完体操回家,会不会给家人和邻居表演?”她说:“从来没有过。”

为什么我却表演得不亦乐乎呢?

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在学体操,生怕没有大家的认可?这种认可,在体操房我是得不到的,只好去家人和邻居那里寻找。而优秀的素华,已无需向别人证明什么了,她知道自己是最好的。

这就如同真正富有的人,无需显示,自卑的人,反要证明自己的强悍一样。

在我一个人练了一年多以后的一个下午,体操房里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,她妈妈手里拿着一大卷宣传纸,在跟路教练交谈着什么。她站在妈妈身边,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,那情景,让我想起了一年多以前的自己。当她看到我的时候,目光停住了,好像是诧异于我的打扮跟大家的不同。

正当我们俩互相打量的时候,突然,我听到路教练那尖利的声音:“小鬼!你过来一下,小鬼!”

一开始,我没有意识到她是在叫我,因为教练几乎从来就没有叫过我。等她“小鬼,小鬼”地接连喊了几声,大家都朝我看过来的时候,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,赶紧从地毯上爬起来,向她们跑过去。

路教练和颜悦色地把这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推到我的跟前说:

“她叫马燕,以后,你们俩一起练吧。”

这个叫马燕的小女孩,从此成了我的小伙伴。

在这个偌大的体操房里,我终于有了一个跟我同样境遇的人,终于有一个可以一起练体操,一起说话的人了。真是如获至宝呀。

我像个小朋友一样地,照顾着她,保护着她。

我们不仅练体操在一起,平时也舍不得分开,因为两家离得不远,她几乎“长”在了我们家。

清晨,天还没有亮,她就跑来敲我们家的窗户,叫我起来晨练。我们俩穿过伸手不见五指巷子,穿过还亮着路灯的马路,认认真真地,毫不敷衍地向体育场跑去。

放学后,我们会相会在体操房,煞有介事地一起换衣服,一起做准备工作。

我就是马燕的教练,虽然我练得也不怎么样,但毕竟比她早了一年多,所以体操房里每天的路数和训练程序,我都逐一耐心地教给她,那些我自学的动作和技巧,也都毫无保留地与她分享。

她很听我这个小小教练的话,这个在孩子眼中无比高大的体操房里,我们是对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。

训练结束后,我们也学着其他队员的样子,相互帮对方做放松。原来没人帮我做的事情,现在都有了,都正规化了。我也把我伟大的梦想传递给了马燕,我们俩要共同向着“科马内奇”进军。

有一天,马燕换上了一件她姥爷用花布给她做的“体操服”。花布没有弹性,她又有那么胖,看起来就像

一个小花球,很是滑稽可爱。

虽然不正规,也比我的棉毛衣棉毛裤强些。我又成了唯一一个没有体操服的人了。

回到家,我就缠着姥爷,让他也帮我缝一件体操服。姥爷坐在那儿想了半天,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,便带着我上街了。

那个时候,体操服、体操鞋都是体校统一发的,商店里不卖,所以我认为姥爷也想去街买一块花布,帮我做体操服。

我们来到市里唯一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,正如我所说的,根本没有体操服和体操鞋卖,只有墙上挂着的几件游泳衣。

“怎么样?”

姥爷问问我。

“什么?”

我不解地看着姥爷。

“游泳衣啊!”

姥爷指着其中一件蓝色的小号游泳衣。

“干吗?我又不会游泳。”

“当体操服来穿嘛,除了没袖子,其他都一样。”

我真服了姥爷,从此我便穿上了游泳衣练体操,我跟小海燕,一个小花球,一个游泳衣,成了体操房的一景。

训练结束后,我和马燕一起,学着其他队员的样子,在地毯上相互做放松。

路教练一边走来走去地喊口令,一边纠正着队员的动作。她走到我们身边的时候,看到马燕帮我放松的动作不正确,就在我的腿上踩了踩,给她做示范。

我幸福地被路教练踩着,真有点儿,真舒服。

路教练边教我马燕,边对我说:

“你这个小鬼,将来要长成大个子的。”

那天,真是我最幸福的一天。

路教练不仅帮我做了放松,她还说,我将来要长大大个子。大大个子多好啊,这不是在夸奖我吗?

长大以后,我才明白,路教练其实是在暗示我,你就别再练体操了,练体操是没有前途的,因为你是大个子。其他运动项目可能需要大个子,而恰恰体操运动员需要小个子。傻大姐一般的我,高兴得拉起马燕一路跑回家,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姥爷。姥爷听了也很高兴,他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外孙女能长大个子,亭亭玉立,多好啊!谁又知道练体操是什么短寿呀。

姥爷看到了教练的表扬带给我的喜悦和兴奋,很想趁热打铁做点什么。正好那天,爸爸托人从新疆带回来几个哈密瓜。姥爷自己只留了一个,其他几个都切成一小牙一小牙的,分给周围的邻居,让大家尝个新鲜。

我是那个负责运送哈密瓜的人。

分着分着,瓜就没了。从李大娘家回来,姥爷拎着一个篮子,站在院子里等我,篮子里还是两牙哈密瓜。他把篮子递给我说:

“给你们路教练送去,让她好好教你,你就能成体操冠军了。”

那时我还不懂贿赂、送礼这些成人世界的游戏,但“拍马屁”是知道道的,这是孩子之间的语言。

为了博得教练的欢心,我要如此降低我的人格吗?从家到体育场,这条路,是如此漫长,我的两条腿,如同千斤重。我拨腿跑向体操房后面的荒草萋萋的一条小河沟旁。这条小河是以前我和姥爷经常一起来捞鱼虫的地方,可我此时却无心去欣赏这自然的美景,只想着下该怎么办。

夕阳渐渐地落下去了,我看到队员们陆陆续续地从体操房里出来,路教练也出来了。一直等到了天完全黑下来,我才离开小河沟,提着篮子,沿着路教练走过的路,向体校宿舍走去。

我第一眼就认出了路教练的家,走到门口,听到路教练跟她儿子说话的声音。她的儿子我是见过的,经常在体操房里玩,很有优越感地跟着妈妈走来走去。

我一面听着屋里的动静,一面观察周围有没有人注意到我,同时还想着,该怎样才能把哈密瓜交给教练。

突然,门动了一下,然后,路教练儿子的声音已经在门口了,说时迟,那时快,我连想都没来及想,拔腿就跑。

门在我身后被打开了,就听见路教练儿子说:

“干什么的?”

我跑出院,跑出了体育场,跑过好几条街道,直跑到上气不接下

侠士,骑士

侠士是国产,骑士是外国货,都是行走江湖、替天行道的蒙面大汉。中国侠士向来在阶级成分上一点也不含糊,很具草根精神。他们大多有个不幸童年,吃百家饭穿百家衣,遵循弗洛伊德老先生的逻辑,长大后就劫富济贫,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。西方骑士则是中世纪宫廷的产物,是娱乐匮乏时代,贵族、命妇吃饱了撑的,给自己找的乐趣。所以,骑士依附统治阶级,负责保安和取悦宫廷命妇,本质上属于嫉恶如仇的中国侠士见了就想狠揍的“恶少”。

酒和女人,自古都是英雄的注脚。中国侠士爱酒,欧洲骑士爱美人。两伙人的分工不同,给人的印象自然也不同。在情爱方面,中国侠士是晚熟型,有的甚至一辈子也不会熟,只有侠骨,没有柔情。经典侠士小说《水浒传》中鲜少的几个女人,其命运却是一个比一个悲惨。潘金莲和阎婆惜就不说了,即便那个很有正义感,又有一身功夫还不至于姿色的扈三娘,最后也只得跟了

侏儒王英。一句话,中国侠士都是正经八百的强盗,都很听妈妈的话,不和女人勾搭,唯一的消遣就是喝酒。那酒喝得也确实豪爽,一只青花海碗,盛的满满的,有时还会滴几滴鸡血或人血,端起碗,一仰脖,咕咚咕咚就下去了,仿佛灌老鼠洞,然后把碗向旁边一丢,拿手掌把嘴巴一抹,铁骨铮铮地站在你面前,痛快得俨然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

相比之下,骑士就有玩物丧志。欧洲骑士电影无非是古装版的007,凡有英雄的地方,必有个性火辣性感美女。一个中世纪人若想做骑士,除了首先为要自己取个封号,还得找个贵妇人,以便他冲向敌营或在黄昏写诗时,有个献身、讴歌的对象。堂吉珂德深谙此道,所以一切准备妥当还差个爱人时,他临时拉来一个村姑充当。这姑娘没见过他,不知他是何方神圣,但这不妨碍堂吉珂德在想象中美滋滋地意淫一把。解救危险处境中的妇女,尤其是处女,是骑士文学的常见题材,他们

十年磨一剑,在太阳下做梦,在梦里流口水,幻想被拯救的小羊羔带着惊吓、感激、爱慕,在他们臂弯里幸福得晕厥。

骑士还会公开表演自己对女人的爱慕,这是主张“红颜祸水论”的中国侠士无法想象的。武术竞技中,骑士们佩带爱人的面纱,穿着爱人的衣服,呼喊爱人的名字,冲向对方。13世纪有个“三骑士与衬衣”的故事。一位贵族为增加竞赛的趣味性,把妻子的内衣赠予三位骑士,要求他们脱掉盔甲,穿着轻薄的内衣上场比赛,前两位骑士拒绝,第三位骑士欣然从命。没有盔甲保护,他受了重伤,但他的苦肉计也赢得了贵妇芳心——这样的英雄爱情,岂止气短,简直是洒脱脱一个洋鬼子版的西门庆,若遇到武松,难保不会当作“奸夫淫妇”,当场被大卸八块。

取悦女人,骑士是一等一的高手,打起仗来,却是脓包一个,简直要让梁山泊的群雄笑掉大牙。15世纪流传的一本小书,专门收录骑士



的军事轶事,其中一则,法军拒绝在海上作战,理由如下:“水上作战有危险,会死人,遭遇风浪时天知道有多难受,许多人难以忍受晕船。此外,船上生活艰苦,不适合贵族……”李逵这个大老粗,一向是二话不说、抡斧就砍,砍了再想的类型,若他听到这么义正辞严的军事逻辑,想必也会惊得目瞪口呆,斧子刹在半空中,忘了落下来。

(本文摘自《思奔——在历史与八卦之间》,寇研著,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第一版,定价:25.00元)

气,在一个没人的墙角,停了下来。

我蹲在地上,过了好半天,才把气儿喘匀乎。看看那个被我提了一下午的篮子,两块哈密瓜还躺在那儿。

我看了看四周,确认没人,就把哈密瓜倒在墙角,提着空篮子走了。

这一天,我的“科马内奇”梦消失了。

从那以后,我对练体操就再也

没有以往的热情了,只是为了让姥爷高兴才去练。“冠军”的梦想,已经不是我的梦想,而只是姥爷一个人的梦想了。

我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:有时跟马燕一起去游泳,有时带她到小河沟捞鱼虫,有时在文工团排练厅外的台阶上,扒着窗户,看哥哥姐姐们排练节目。

另一个不想回体操房的原因,是怕见到路教练。

虽然那天路教练并没有看到我,但她儿子打开门后,可是看到我了我。他会不会告诉妈妈?路教练会不会问我为什么去她家?去干什么?那我该怎么回答?

好不容易克服了心理压力,再去体操房的时候,发现其实自己的种种猜测都是多余的,压根儿没有人多看我一眼。

在那段有一搭无一搭地练体操的日子里,爸爸从新疆调回来了。出于好奇,爸爸想看看他的外孙女是怎么练体操的。一天下午,爸爸的脑袋,从体操房的没玻璃的大窗外,悄悄地探了进来。

他看见他的外孙女,穿着蓝泳衣、白球鞋,和穿着花布体操服的小马燕,孤独地在地毯的一角玩耍着,没有人理睬她们。

教练正在辅导那些身穿体操服和体操鞋的正式队员。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列,一个接一个地翻着高难度的跟头,空中转体 180 度,生龙活虎。而地毯边上的那两个小孩,互相搀扶着做动作,如同小丑的表演一般。

爸爸坐在椅子上,一直盯着我看。

我全然不知下午发生的一切,兴高采烈地吃着饭。爸爸突然说:“今天下午,我去体操房了。”

我和姥爷、妈妈都看了看爸爸,妈妈高兴地问:

“是吗?我们的体操冠军练得怎么样啊?”

爸爸没有理会妈妈,还是盯着我说:

“你一直都是这么练体操的吗?”

我低下头,不敢看爸爸的眼睛。大家谁也没说话,气氛很压抑。爸爸又问:

“你为什么把这个情况告诉家里人呢?”

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,“滴答滴答”往下掉,妈妈和姥爷也放下了筷子,大家都默默地看着我,等待着我的回答。

我怎么回答?

这时候,只能听到钟表“滴答滴答”的声音了。

爸爸最后说:

“你以后不要再回去练体操了。”突然,我的内心里感到无比快乐,就像囚徒得到了自由一般。我仰起脸,满脸是泪,感激地望着爸爸。

我的命运,掌握在父母手中,父母的命运,又掌握在社会手中。我们都无形的压力捆绑着往前走,反倒不是远道而来,不在其中的爸爸,用他干脆利落的一句话,解放了我三年来的桎梏,解放了我的天性。我的体操生涯就这样结束了。

(本文摘自《姥爷》,蒋雯丽著,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第一版,定价:34.80元)